

# 粵港澳合作的研究

廣州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編著

主編 何佳聲 封小雲 張炳申

香港新聞出版社

深淺合作  
前途似錦

此筆

西元五 13.

書名：粵港澳合作的研究  
作者：何佳聲 張炳申 封小雲  
出版/承印：香港新聞出版社  
地址：元朗青山道99號元朗貿易  
中心24樓  
電話：4750383（6線）  
電掛：0336  
日期：1990年10月  
定價：港幣3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把深港两地各自的优势更好  
地结合起来，发展以工业、科  
技合作为主的多元化经济合作  
关系，为两地产业共同升级、经  
济协调发展，开创全新的局面。

周维平

一九九〇. 2. 20

# 目 錄

序.....	1
--------	---

## 香港與深圳工業合作問題的研究報告

一、內地與香港經濟技術合作的基本狀況.....	3
(一) 內地與香港經濟技術合作的新階段.....	3
(二) 深圳與香港經濟合作的現狀.....	6
二、深圳工業的發展.....	15
(一) 深圳工業發展的回顧.....	15
(二) 深圳工業發展與結構的演變.....	18
(三) 深港工業合作已顯成效.....	34
(四) 深圳工業發展中的主要問題.....	39
三、深港工業合作的前景與建議.....	45
(一) 深港工業合作的條件與基本態勢.....	45
(二) 加強深港工業合作的戰略性建議 .....	48

## 珠海經濟的發展與澳珠經濟合作

一、珠海經濟的增長與經濟發展態勢的分析.....	73
(一) 珠海經濟增長態勢與分析.....	74
(二) 珠海經濟發展的成效與分析.....	80
二、澳珠的經濟聯繫與合作.....	93
(一) 澳珠經濟聯繫與合作的現狀.....	93
(二) 澳珠經濟合作的前景與建議.....	101

## 加強內地與香港的科學技術合作

一、中港科技合作的前景和問題.....	110
二、淺析粵港科技合作.....	115
三、發展粵港科技合作的構想.....	122

## 粵澳教育問題的合作

粵澳教育問題合作的初探.....	132
編後語.....	146

# 序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將是廣東和香港、澳門的經濟發展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關鍵時期。

在這個歷史時期中，廣東的經濟將在前十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通過治理、整頓和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提前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第二步的目標，而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邁進。而香港和澳門則將回歸祖國，在“一國兩制”的格局中進一步發揮自身的優勢，進一步加強與廣東以及整個內地的經濟聯繫和合作，並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在全世界的經濟活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當然，這個時期的世界經濟也將處在迅速的變化與發展之中。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亞太地區新興工業國家的崛起，中、美、日三角格局的形成，以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增加，這些因素又將對廣東、香港和澳門發生直接的影響。因此可以這樣說，在本世紀的最後十年中，粵、港、澳三地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並存，希望與困難同在，如何加強三地的合作，以求共同的發展和繁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廣東、香港、澳門三地經濟，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密切聯繫的整體。歷史上就有“省港澳”之稱。這裏有着人之、地緣和歷史傳統的因果關係，合乎邏輯地形成了華南經濟圈。最近幾十年來，三地經濟雖然都有各自的发展變化，但它們之間的互補性、共生性，以及梯度替代性始終存在。特別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廣東的外向型經濟迅速發展，粵、港、澳在經濟、貿易、金融、科技、教等等方面的聯繫合作日益擴大和深化。按照開放經濟的發展規律，三地都在互相合作、共同發展中取得了先發性利益和後發性利益的效應。由此可見，粵、港、澳只有合作，才能發展，才能在世界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勇往直前。這是歷史和現實的結論。

因此，正當九十年代第一春到來的時候，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編輯其研究成果《粵港澳合作的研究》一書出版，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本書着重對廣東的深圳、珠海兩個經濟特區和香港、澳門之間經濟合作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因為這兩個特區毗鄰港、澳的合作，首先在這裏最集中、最典型地表現出來。本書新到各項專題研究報告，又是粵、港、澳三地專家學者共同合作完成的，並由香港新聞出版社出版。所以，本書的出版，也是粵港澳合作的一個體現。

願本書為推進粵、港、澳合作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一份貢獻！

張元元

1990年3月  
於廣州暨南大學

# 香港與深圳工業合作問題 的研究報告

## 一、內地與香港經濟技術合作 的基本狀況

### (一) 內地與香港經濟技術合作的新階段

衆所周知，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由於歷史原因，帝國主義用炮艦政策，使其脫離母體，長期以來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政府一再聲明，不承認十九世紀外國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將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這一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草簽的《中英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聲明》），已經兩國最高權力機構批准而生效。《聲明》指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對香港行使主權。在“一國兩制”的總指導原則下，在香港設立直轄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將以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生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管治香港，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在香港將實行一套不同於中國內地的特殊政策。其目的是繼續維持香港繁榮和穩定，更有效地發揮其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的作用。此舉得到具有愛國主義傳統的香港同胞的熱情支持和擁護，也為國際上和平地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提供了範例，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友好人士和工商企業界對此深表讚賞。然而，歷史發展的進程總不是一帆風順的，要在數經滄桑的曲折中前進。為此，本文試以歷史淵源和唇齒相依的關係，展望共創九十年代兩地繁榮的前景。

#### 1. 歷史的淵源關係

香港長期脫離母體而屹立於太平洋邊緣，人們用文學語言把它

稱為：“銅鏡”、“瓷器”、“木棉樹”或“東方明珠”、“知風鳥”等，這些寓有詩意的稱法都反映了香港的長處和特點。但香港與祖國大陸地理位置接壤，風俗習慣相同，語言相同，鄉音悅耳，經濟上相互依存均是經濟增長和騰飛長期且經常起作用的因素。據有關史料記載，香港從本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已成為內地的轉口港。從一九三一至一九四〇年，香港向內地轉口的商品貨值年平均遞增為百分之四十三點五三；同樣，內地輸入香港的貨值，年平均遞增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一一。可見，無論出口或進口，內地均為香港的第一位的貿易伙伴。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由於中國大陸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兩地的貿易關係雖有所縮減，但沿海大城市的那些對新中國政權暫不理解的工商企業界人士，帶着其資金、技術設備、技術力量轉移到香港，隨之大量勞動力也湧入香港，從而香港人口從一九四八年的一百八十萬人，到一九五〇年劇增為二百二十三點七萬人。一九五〇年比一九四九年，香港人口劇增百分之二十點五，成為香港有史可查的人口增長率最高的一年。從此，香港從貿易轉口港轉化為以紡織為主體的製造業中心。正如香港原總商會主席、香港立法局議品格士德先生所云：“棉紡業最初移來香港，這代表著一種新工業，有無可估量的經濟意義”，“上海紡織工業家為香港工業化所帶來的動力無可估量”，“香港從經濟危機邊緣拯救出來”。

從六十年代開始，資本主義世界處於經濟繁榮期，香港人憑着其善於適應國際市場環境的能力和香港經濟富有彈性的特點，抓住發達的國家工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嚮，實施出口導嚮發展戰略，有效地促進了製衣業的發展。成衣的出口，一九五一年佔其產值的二十分之一；而一九六二年劇增為佔港產品出口的三分之一，並帶動了電子、玩具、鐘錶等既是勞動密集型的、又是新興行業的建立，從而形成了以製造業為支柱的經濟結構。一九七〇年，製造業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十點九，佔就業總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港製品的出口值佔其出口總值的百分之八十。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九年，為香港經濟騰飛期，其經濟的年平均遞增率為百分之十三點六，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國家

和地區中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地區之一。然而，從六十年代初到粉碎“四人幫”為止，內地處於天災、人禍的威脅之下，兩地的貿易關係嚴重縮減。一九六四年，香港對內地的貿易額，佔其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四點二，一九七四年下降為百分之九點八；香港轉口到內地的商品貨值，一九六四年佔其轉口值百分之三點四，一九七四年下降為百分之二點八。即使在這個歷史時期（如六十年代中期），當香港面臨着苦旱缺水之際，內地東江之水，仍源源不絕地供應，每年達到七百多億加侖（折合二千一百萬立方米），使香港免受缺水的威脅，有效地保證了香港人民生活穩定和工商業的發展。七十年代，全世界面臨着石油危機的威脅，而內地石油供應也相當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仍騰出部份原油，以低廉的價格供應，使香港工商業免因世界能源危機而遭受其害。從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內地供應香港燃油增長了四十七倍，即從一九七三年的一千萬港元，到一九七七年為四點八億港元，從而使整個七十年代香港經濟仍保持百分之九點二的增長率。

綜上簡述，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聯繫，從總體上來說，長期以來主要是貿易伙伴關係。

## 2. 80年代兩地的唇齒相依關係

從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已進入一個全面合作的新階段。其主要表現是：

### (1)兩地貿易額劇增，內地成為香港最大的商品供應地

兩地貿易額一九七八年為一百零八億港元，到一九八八年上升為二千八百八十五億港元，增長二十五點六倍，佔香港貿易的總額，從一九七八年的佔百分之九點二，到一九八八年上升為百分之二十點九，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兩地的貿易額仍為一千九百二十八億港元，比一九八八年的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一九七八年內地輸港的貨品佔其入口的百分之十七，一九八八年則增為百分之三十一，從一九八二年開始，內地已成為香港最大的商品供應地。

### (2)內地為香港產品出口的第二個大市場

港產品出口到內地，一九七八年僅為零點八一億港元，一九八六年為一百八十點二億港元，一九八七年為二百七十八點七億港

元，一九八八年為三百八十點四億港元，一九八八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四百六十八倍，年平均遞增率為百分之八十五，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出口市場，佔港產品的出口總值，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零點二，上升到一九八八年為百分之二十，其中原材料和零配件佔百分之七十。

#### (3)內地為香港第一位的轉口市場

一九七八年內地經港轉口的貨值僅為三十六點六億港元，一九八七年增為八百四十二點七億港元，年平均遞增率為百分之四十二。經香港轉口到內地的商品貨值，一九七八年為二點一億港元，一九八七年為六百零一點七億港元，一九八八年為九百四十八點九五億港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四百四十九倍，年遞增百分之八十七。一九八九年上半年香港轉口內地的商品貨值，佔其轉口值的百分之三十三，比一九八八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五。總之，中國供應及吸納香港轉口貨值的百分之七十九。

#### (4)香港為世界各國通往內地的門戶

兩地無形貿易也在增長，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六年，從香港往內地的旅客，年平均遞增率為百分之二十一，一九八六年已達一千一百九十萬人，經香港前往內地的外國旅客七十多萬人次。一九八七年香港接納外國旅客為四百五十萬人次（不包括內地），比一九八六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一。整個八十年代，在來港的旅客中，有百分之十六至二十是以中國內地為目的地。旅遊業的發展，帶動了香港其他行業的發展，旅遊業已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活力因素”，香港也成為世界各國前往內地的門戶。“六四”事件後，香港旅遊業受到最大的衝擊，住房率僅為百分之五十以下，降為八十年代以來的最低點，但八月份開始已逐步復蘇。

#### (5)香港已成為內地通往國際市場的橋樑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七年九月，香港對外貿易與貨運量同步增長，年遞增率為百分之二十；從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五年，由內地入口的貨物，以噸數計算，年平均遞增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的商船到香港港口的數目增加七倍，轉口到內地的貨運量增長百分之三百六十四。以內地為對象的轉口業務，約佔香港轉口貨物總數量的四分三，從而使香港港口吞吐量已超過了美國紐約

港，成為僅次於荷蘭鹿特丹的世界第二大的港口；從一九八七年開始，葵涌綜合貨櫃碼頭的貨櫃處理已超過鹿特丹，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貨櫃港。

#### (6)香港成為內地與國際主要金融市場聯繫的媒介

截至一九八八年止，全港有持牌銀行一百五十八家，其分支機構二千多家，各銀行的資產總額為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三點九四億港元。近十年來，隨着內地對外開放的深入發展，香港各銀行的存貸總額不斷增長，一九八六年存款總額為五千五百零六點九億港元；一九八七年存款增長為七千零三十六億港元，貸款增長為七千七百八十七點八億港元，香港金融機構對內地客戶的貸款餘額，一九七九年為一億多港元，一九八七年劇增為二百三十二億港元，年遞增率為百分之九十四。香港從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七月，給內地大型項目的銀團貸款已達二百六十二點一億港元，這反映了兩地金融機構的聯繫和資金融通正在加強，香港已成為內地籌資的重要場所。

中銀集團在香港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也正在增強。一九八六年其存貸總額分別比一九八五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五十一；其資產總額佔全港銀行資產總額的百分之七點二。同年，香港所有金融機構的總資產額祇增長百分之三十，存款額祇增長百分之二十八；而中銀集團在香港的零售業務卻有所擴展，其所吸收的存款額，佔全港金融機構所吸收的存款總額的百分之十八，其職工人數佔百分之十七點七。銀行的服務領域和種類也有所增加，尤其近十年來中銀集團存貸總額同步增長，年遞增率為百分之三十。

#### (7)香港工商企業已成為內地最大的投資者

到一九八八年為止，全國批准一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實際直接投資額為一百二十一億美元，其中港澳客商投資佔百分之八十二點六，僅一九八八年港商投資內地興辦“三資企業”就達三十億美元。投資的領域，從開始投資於酒店、旅遊、房地產，現已逐步擴展到電子、紡織、製衣、塑膠、玩具等，以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為主。投資的區域，從經濟特區、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帶，逐步向內地和資源產地擴散。廣東省截至一九八八年底止，共有“三資”企業七千三百七十七家，佔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港澳客商投資的佔百分之九十三，其投資額佔總投資額的百分之八十五點二。在

廣東省有“三來一補”企業二萬多家，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為港澳商人投資的，從事裝配業務的工人為二百多萬人，實際投入資金為二十億美元，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七年獲取工繳費為二十億美元，其加工值約佔香港工業產值的百分之三十，有的行業，如皮革、電子、塑膠行業高達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香港大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中型工廠，在內地設有分廠或加工業務。一九八八年兩地的貿易額中有百分之四十七與港商在內地加工業務有關係。一九八九年上半年這種關係表現為：香港出口內地貨值的百分之五十四，製成品的百分之七十六，轉口貨值的百分之四十六與內地加工業務有關。

#### (8) 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增加，經濟上互相滲透加強

一九七八年以前，在港的中資機構，主要是為進出口貿易服務的航運、交通、金融和貿易服務網絡。目前，內地在香港的投資已滲透到商業、貿易、金融、飲食、旅遊、空運、製造業、建築業直到房地產業，內地已成為在香港僅次於美國、日本的第三位的外來投資者，約為八十至一百億美元，其中有百分之五十是近幾年來發展的。內地的承建單位，在香港投標承建的公共工程項目和金額，為海外承建商的第二位，並開始投向房地產市場。

上述分析說明，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聯繫日益密切，合作的領域逐步擴大，經濟上互相滲透，唇齒相依，血肉相連，正在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區域經濟，也為香港經濟發展增強了新的活力。對此，香港學術界、工商企業界也認為：“香港近年來，由於加強了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即通過擴大中國市場來減低對西方和日本市場的依賴比重，也轉移部分勞動密集的生產程序往廣東等地以減輕成本”，“增強了港貨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總言之，所謂中國大陸因素，已成為八十年代香港仍得以維持百分之八點三較高經濟增長率的重要支持”。

## (二) 深圳與香港經濟合作的現狀

### 1. 深港經濟合作的階段性

自一九八〇年深圳特區創辦伊始，港深經濟合作日益密切，合

作的規模由小而大，合作的層次逐步加深，且擴展到整個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以及沿海開放地區，這種發展趨勢對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階段：從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即深圳特區打奎基階段。此階段，港深經濟合作以貿易為主、投資為輔，香港對深圳的投資，重點在商業服務、旅遊和房地產，對工業投資亦以“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特區創辦之初，作為國內率先對外開放的窗口，部分企業享有進出口經營權，在利潤機制的調節下，特區形成了以進口——內銷為主的貿易發展格局，即進口香港產品或元器件在特區加工組裝，銷往內地。這個階段，特區進出口出現嚴重的不平衡，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四年間，深圳每年進口額與出口額之比分別為 4.6:1、2.2:1、2.9:1 及 2.2:1。一九八五年深圳出口額為六點零九億美元，而進口額高達十三點六億美元。這種發展格局為香港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國內市場，內地市場在港產品出口總值中所佔比重從百分之二點四躍進至百分之十一點七，一舉成為港產品第二大市場。就特區而言，亦從中獲得可觀利潤，成為特區吸引資金、擴大積累及繁榮經濟的主要因素。不過，這種活動對國內的經濟和市場均造成嚴重的衝擊，其負作用也是相當明顯的。

第二階段：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七年，即特區經濟轉型階段。到一九八五年，以進口——內銷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格局，受到國內日益強烈的批評，深圳逐轉上以發展工業為主的建設方針。隨着香港產業結構的調整及特區投資環境的初步形成，港深合作深入到工業層面。這個階段，“三來一補”業務盡管在產值上有巨幅增長，並透過特區擴展到寶安、東莞以至整個珠江三角洲，但它在特區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卻從百分之三十七點二降至百分之八點三（一九八七年）。獨資、合資和合作經營逐步成為港深經濟合作的重要形式。到一九八七年，外商在深圳工業的協議投資額已達二十點八九億美元，實際投入八點七一億美元，其中港商佔八成以上。一九八五年以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在特區工業總產值中比重已超過百分之六十，成為特區工業的支柱。到一九八七年，特區外貿出口急增至十四億美元，首次出現貿易順差，外向型經濟趨向形成，港深經濟合作發展為“前店後廠”的分工格局。

第三階段：大體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港深經濟合作也從貿易、工業擴展到金融、科技、信息等各個層面，合作規模亦更加宏大。雙方進入全面合作階段。特別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在內地造幾個香港”的談話後，深圳借鑒、移植香港經驗的工作已在房地產業、證券業等行業展開。至此，港深合作已形成“互補長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密切關係。

總之，港深經濟合作的基礎，是雙方的比較利益優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香港具有資訊發達、融資便利、與國際市場有天然聯繫、工商管理人才充足等優勢；它的弱點是土地資源有限、勞工短缺，高科技人才不足。深圳與香港相反，它以珠江三角洲為腹地、土地、勞工充裕且成本低廉，又有國內雄厚科技力量為後盾。兩者結合可互補不足，相輔相成，提高兩地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從過去的實踐看，這種合作已成為香港經濟高速增長，保持繁榮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推動香港經濟從島嶼經濟走向大都市經濟，日益成為南中國和亞太區的服務中心。而從深圳看，一九八八年其國民生產總值達七十三億元，工業總產值八十八點八億元，出口貿易十八點五億元，與一九七九年相比，每年平均遞增百分之四十九點五、百分之七十三點九及百分之八十點七。港深合作已成為深圳工業化、國際化的重要動力。

## 2. 深港經濟合作的深遠意義

(1)港深經濟合作對於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具重要戰略意義。不少學者指出，深圳具有的優勢中，最基本且長期起作用的是毗鄰香港，這種地理位置的優勢使其處於中國對外開放體系的最前沿。目前，深圳已與國家四十六個部委辦、總局及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共計二千九百八十六個內聯企業。港深經濟合作實際上已蘊藏香港與中國各省、市、特別是沿海開放地區合作的實質，這對於沿海地區及內地省、市引進資金、技術、信息、人才及管理經驗，發展外向型經濟具有重大推動作用。從過去幾年的實踐看，這種作用在廣東省表現得尤為明顯，港深經濟合作已發展為香港與廣東的全面合作，使廣東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快的省分之一，改革開放亦走在全国前列。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港深經

濟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是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進程的標尺和指示器。

(2)港深經濟合作成為維持一九九七年前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成功實施“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因素。目前，香港正處於一九九七年主權回歸中國的歷史轉折時期，其經濟亦面臨着一系列的困難：因“信心問題”而出現的移民潮和資金外流，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香港經濟的競爭力；因投資短期化、企業規模小和港府的不干預政策，香港工業轉型已落後於南朝鮮、台灣，而其勞動密集型產業，又因土地及勞工成本的上漲而日益失去比較優勢；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面臨着東京、新加坡及台北的挑戰。香港如何解決上述困難，並在一九九七年主權回歸中國前後繼續維持繁榮和穩定，已引起國際間的關注，同時亦是中國改革開放，實現經濟現代化歷史任務中一個重大的問題。近年來香港與深圳，以至整個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舒緩香港經濟面臨的壓力和困難，增強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中港經濟合作的發展，還會大大加強香港在國際經濟中的戰略地位。就內地而言，香港成為中國沿海地區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最便捷的通道和橋樑；而從國際資本看，它成為國際資本進入大陸市場最重要的跳板。這種戰略地位將有利於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因此，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方針及進一步密切中港經濟合作關係，已成為一九九七年香港前後維持香港繁榮和穩定的重要條件。香港與深圳的經濟互補長短、相輔相成並趨向一體化，對於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的順利回歸及“一國兩制”方針的成功貫徹，意義重大。

(3)港深經濟合作對於進一步密切海峽兩岸的經貿關係，形成中、港、台經濟合作圈，以及台灣回歸亦具重要的戰略意義。近年來，香港已成為海峽兩岸經貿合作的中介和樞紐，香港與深圳以及中國大陸經濟合作關係的發展，大大加強了中、港、台之間經濟合作的趨勢，港深合作就已包含中港台合作的內容。如由香港興輝工業發展公司和深圳國際工程公司合資開發的深圳福田保稅區的華夏工業園，就是一個由香港台灣貿易促進會負責籌劃的專供台商投資辦廠的保稅出口加工區。香港、台灣的資金、技術、市場、信息與中國

大陸的資源、勞工結合，必將大大增強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綜合國力，進而改變整個國際分工的格局，推動上述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繁榮，並最終有利於台灣回歸、完成統一大業。當然，必須明確一點，中港台經濟合作關係的發展，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就是國內政治的穩定、開放和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 3. 進一步加強深港經濟合作

深港之間的經濟合作，雖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從進一步發展兩地的合作，促進兩地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來考慮，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 (1) 在管理體制上逐步“接軌”，按國際慣例辦事

深圳經濟特區須在一九九七年前，逐步建立能與香港對接的、按照國際慣例運行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體制。這是因為，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後，深圳特區作為“一國兩制”的前沿，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香港的結合部，必須建立起能與香港對接的、按國際慣例運行的新體制，以適應港深兩地間經濟的更廣泛深入的交往和合作。因此，作為決定特區方針政策的中央政府，應以更大的決心和氣魄，加快深圳特區體制改革的步伐；深圳特區亦應配合中央政府，組織力量加強對香港的研究，加快借鑑、移植香港和國外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的管理體制和經濟法規，爭取在一九九七年前形成特區科學、精幹、高效、廉潔的行政系統，清晰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功能健全的市場體系，把深圳建成具有類似香港功能的國際化城市，實現與香港的對接，真正發揮出“四個窗口”和“兩個扇面”的功能和作用。特區在建立新體制的過程中，還可發揮試驗場的作用，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借鑑和經驗。

但深圳特區的經濟管理體制，雖然進行了比較大的改革，有了大的進步，但無論是吸收外資、引進技術、信息的吸收和反饋、開拓海外市場的組織等各個方面，都有待進一步地完善和提高，就以利用外資審批來說，就存在着審批機構職責不明，分工不清，相互間的工作協調不夠，以至程序繁雜。過去由科級機構可以審批的問題（一個審批環節），現在升格為由局級機構審批以後，往往變成兩三個環節（科、處或科、處、局）；有時甚至重複審查，多頭把